

追尋元氣淋漓的五四

——評陳平原《未完的五四：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

●楊秋雨



陳平原：《未完的五四：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

1921年，李大釗在紀念五四運動時說：「我更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

加上些新意義。」^①在歷史腳步的輾轉之中，對「五四」議題的各種研究和闡釋層出不窮，「新意義」也在見解紛繁之中不斷更新、交疊和碰撞。陳平原長期關注五四史與北京大學史，在近代學術史、教育史、文化史諸領域成就卓越。其論文集《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②，在2018年一經推出即受到學界關注^③。新近出版的增訂本《未完的五四：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以下簡稱《未完的五四》，引用只註頁碼），在原作基礎上新收七篇文章，結構和線索更加明晰。不同於陳平原討論五四的其他著作^④，作者自陳本書是帶有「論戰性質的評說」，故要「超越專業視野，追求具有某種內在精神力量的論述」（〈序言〉，頁xii-xiii）。不過，恰如副標題提示的「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本書除了闡發作者「壓在紙背的心情」（〈初版序言〉，頁xvi），亦對五四歆動人心、異彩紛呈的思想現場有所勾勒。作者一以貫之的現實

陳平原《未完的五四》在原作基礎上新收七篇文章，結構和線索更加明晰。不同於陳平原討論五四的其他著作，作者自陳本書是帶有「論戰性質的評說」，亦對五四異彩紛呈的思想現場有所勾勒。

關懷和鉤深致遠的學術求索，在《未完的五四》之中得到更為圓融的展現。

一 內容和結構

本書除了序言和附錄外，由分為五組的十四篇文章組成。總體而言，第一組文章展示了作者不斷與「五四」對話以操練思想的努力和追求。第二到第四組文章以五四為基點，體現作者在歷史長程之中追索五四的學術思考和現實關懷。其中第二組文章帶領讀者回到五四現場，查考彼時鮮活生動的思想風景；第三組文章從晚清追溯五四之源流與兩代人的接力和合力；第四組文章揣摩五四被記憶和闡釋的歷史心路。第五組文章是作者在五四百年紀念之際的回顧和感受。

第一組「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包含新作〈為何不斷與五四對話〉和兩篇舊作〈走不出的「五四」？〉、〈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

「五四」〉。這些文章可與第五組的兩篇文章合而觀之，集中申說了陳平原五四研究的現實關懷和學術追求，而且娓娓道來五四研究與其個人學術成長的歷程。對作者而言，五四「既是專業，也是人生」（頁16），他寢饋其中所得之種種具體主張背後，是歷史與時代風雲起落的共振，是學術與個人生命路迹的交織。

第二組「多元並存的五四時代」由三篇新收入的文章組成。〈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強調要把握和共情「危機時刻」的時代基調，進而理解當時讀書人的思考、心境和言說。〈新文化運動中「偏師」的作用及價值——以林琴南、劉師培、張競生為例〉勾勒以往研究或是忽視、或是誤解，甚至醜化的三位人物的形象，發掘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複雜性和豐富性。〈直面核心文本——《五四讀本》前言〉進一步強調要直面時人核心文本，看到多端紛呈的思想世界。

《未完的五四》延續了《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的特色，即方法論層面上的思考。本書新增的文章，一方面具體展示了作者尋究五四歷史現場的實踐和努力，另一方面亦包含了作者對於五四在當下語境中的新思考。



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五四運動浮雕（資料圖片）

第三組「兩代人的合力」由三篇文章組成。〈「新文化」如何「運動」——關於「兩代人的合力」〉和新收入本書的〈互相包孕的「五四」與「新文化」〉可以對照閱讀。二者雖寫作時間不同，但都辨析了學界常用的「五四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三個概念，主張討論「五四」，要看到晚清與五四兩代人的接力與貢獻，發覆歷史的來龍去脈和不同維度之間的關係。〈何為／何謂「成功」的文化斷裂——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運動〉論述了新文化運動作為「文化斷裂」的成功之處。

第四組「五四的闡釋和傳播史」皆是原已收錄的文章。〈波詭雲譎的追憶、闡釋與重構——解讀「五四」言說史〉勾勒中國大陸1949年以來五四紀念的歷史概貌。〈「少年義氣」與「家國情懷」——北大學生之「五四記憶」〉追訪海峽兩岸的北京大學畢業生對五四的記憶構建之異同和起伏升降。〈兼及「思想」、「文采」與「行動」〉稱頌五四新文化人「文采飛揚、思想深邃、行動果敢」的境界和氣質（頁202）。

新收入本書第五組「我的五四之路」的文章〈從「觸摸歷史到思想操練」——我看五四及五四研究〉和〈我的「五四」百年〉透露出作者在五四百年之際的複雜心緒。前者勾畫作者一路追躡五四的歷程和立場，後者重點描述了作者身歷中外三場學術會議的不同感受。

「五四之於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⑤陳平原在本書中多次引述和提及此話。對待這樣一個複雜多歧又不無

「陷阱」的歷史命題，作者既不願將之局限於書卷的藩籬之中，也不願看到「五四」淪為空泛的符號，失去回應現實的活力。《未完的五四》延續了《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的特色，「包含了作者討論『五四』的某種方法論層面上的思考」^⑥。不過，本書新增的文章，一方面具體展示了作者尋究五四歷史現場的實踐和努力，另一方面亦包含了作者對於五四在當下語境中的新思考。嚴肅細緻的史學探索和操練思想的對話意識可謂水乳交融。筆者以下主要就本書部分增訂內容進行評述。

二 歷史現場

張灝曾觀察到，人們常用反帝、反封建等「政治套語」，或民主、科學、民族主義與反傳統主義等觀念「代表五四的核心思想」，並以此「構成了五四的基本形象」^⑦。這無疑是對「五四」的簡化和抽象，也是陳平原所排斥的。陳平原所珍視和維護的是「複雜、喧囂但生氣淋漓」而且「很難一言以蔽之」的「五四新文化」（頁27），他拒絕片面化和標籤化的思考方式，不願用那些已經被反覆洗練、刪汰的口號和敘述代表「五四」，而是要呈現彼時見解紛紜、充滿各種走向的思想局面。他希望讀者能夠「直面核心文本」，分辨文本之中「路徑縱橫交叉，聲音抑揚起伏」的錯雜樣貌（頁84）。如此，則「需要有大視野，同時也需要具體的歷史細節」（頁22）。這樣的思路和取向在本書中有具體的實踐。

陳平原所珍視和維護的是「複雜、喧囂但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他拒絕片面化和標籤化的思考方式，不願用那些已經被反覆洗練、刪汰的口號和敘述代表「五四」，而是要呈現彼時見解紛紜、充滿各種走向的思想局面。

作者勾勒深受以往歷史敘述塗抹薰染的「偏師」的作用，釐清林琴南、劉師培和張競生在歷史舞台上的角色和本來樣貌，力圖以更加廣袤的視野看待「五四」，盡可能容納不同的聲音。

〈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一文瞄準晚清和五四兩代人面臨的時代語境，捕捉「危機時刻」中危機感層層積累的讀書人的緊迫心緒，可謂切中了彼時的時代之風。由此出發，作者勾勒「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的光景中那一代人「雜覽」和「雜學」的特色，進而連綴「綱常鬆弛」的政治社會背景。陳平原尤為讚賞時人「特立獨行、勇於抗爭」的批判與懷疑精神，認為「敢於並善於懷疑，『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持強烈的自我批判立場，此乃晚清及五四的時代特徵，也是其最大的精神遺產」（頁59-60）。危機之中形成的思考和氣質表現在「以報章為中心」的表達媒介之時，呈現了「瞬間反應、激烈表態、策略思維、思想草稿等特徵」（頁64）。立論激越，劍走偏鋒，揮斥方遒的「思想草稿」，雖留下各種問題和縫隙，但也為後人播下思想的種子。

在篇幅不大的文章之中，作者延續了平視晚清與五四的視角（頁115），既勾勒出籠罩人心的時代氛圍，又細緻體察到時人思考背後的心思策略，豐富而立體，又不失輕盈和細膩。除了思想辯駁和交鋒，作者亦關注到影響這些內容傳播的「立論方式及文章風格」（頁67）。報刊等傳播工具本就影響着思考的表達。報章文字注重一鳴驚人、撼動社會的現時效應，具有強烈的對話辯駁意識。報人落筆時，深思熟慮和謹慎克制讓位於情緒化和激烈化的表達。這些言論不乏真知灼見，同時留下意味深長的延長線，值得後人不斷追索和闡發。再如作者注

意到新文化運動同仁製造話題的策略（頁66-67），還更為敏銳地捕捉到文字背後微妙的、看上去沒那麼理性的因素，能觸及時人複雜而糾結的思想之中隱伏的憤懣掙扎和微妙心境。

作者看到了五四一代因時代重壓而「慌不擇路」，「心情峻急」，因此有「上下求索的勇猛與果敢」（頁48、55、61）。這反映出除了五四新文化人頗富「心機」地挑動和擴大社會關注的計策之外，或許還要考慮到那些思想火花背後可敬可愛的「孩子氣」和「勇猛的精神」^⑧。時人言說背後時時閃動而難以抑制的情感和激情，那穿透紙背的熱情和溫度，也值得重視。《新青年》等雜誌「偏重鼓吹」^⑨，固然不無可指摘之處，但全然用策略性解釋當時的新舊之爭，恐怕也會壅蔽我們感知當時讀書人的意氣風發和胸中塊壘。由此，讀者不難體會時人面對多元選擇時，不必顧慮過多的幸運與慌不擇路的苦痛彼此糾結。當下面對時人的言說之時，大概既要少些苛責挑剔，也要多些敏感謹慎。

〈新文化運動中「偏師」的作用及價值〉則勾勒深受以往歷史敘述塗抹薰染的「偏師」的作用，釐清林琴南、劉師培、張競生三位人物在歷史舞台上的角色和本來樣貌。如陳平原研究文學史時所言：「活生生的文學歷史本就『枝節橫生』，不像史家筆下描述的那麼『順理成章』。」^⑩呈現枝節橫生、複雜而深刻的「五四」，要盡可能表現出歷史的蜿蜒和參差。新文化運動獲得巨大聲勢，遮蔽了其過程的漫長曲折，也篩落乃至醜化了其間步調不

一的各色人物。作者強調：「凡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參與對話的，不管立場左中右、聲音高中低、力量大中小，都值得稱道，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地位」（頁74），力圖以更加廣袤的視野看待「五四」。

作者顯然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展露出更大的關懷，即新文化運動這個大故事的謀篇布局。作者強調要突破簡單的新舊對立，盡可能容納不同的聲音，「困難不在於具體個案，而在整體的論述框架」（頁82）。如今一些被遮蔽或忽略的五四人物愈加受到重視^①，「偏師」、「像樣的反對派」（頁130），乃至「半信者」^②等形形色色人物的面目愈來愈明晰，關於這些人物在歷史舞台上的位置和作用，值得仔細思考和認真對待。換言之，「音符」已經愈來愈多地被發現，該如何將之創作成一首容納不同聲部和變奏，包含不同的樂章和主題的歷史交響曲？拆解掉那些整齊劃一的敘事之後，如何重建更豐滿立體的歷史現場，仍有待更多的實踐和嘗試。

陳平原對於歷史現場進行張弛有度的思考，力圖呈現出一個細膩深刻、元氣淋漓的「五四」世界。或許只有還原和接近這樣的「五四」，我們與「五四」的對話才能真正鍛煉思想和精神，並將之轉化為積極的思想資源。

三 思想對話

陳平原說，本書的文章「即便是專業論文，也都是歷史研究與現實關懷相互纏繞」（〈初版序言〉，

頁xvi）。前文提及的〈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的寫作即是作者有感於年輕一代無法共情當年內憂外患、亡國滅種的語境（頁45）。從歷史出發與「五四」進行思想對話，回應時代和現實是本書的主要關懷。

強烈的對話意識，與作者本人的經歷息息相關。從1980年代一路走來，陳平原在精神上承接「五四」，對於「新文化」有特殊的情感。作者自陳：「我深受五四新文化人影響，談及學問，對回應時代話題有很高的期待。」「我也正是在與五四的不斷對話中，逐漸提升自己的學問及精神境界。」（頁14、3）五四與現實深度糾纏，作者的研究之路就經歷過種種風波和尷尬（頁7-9）。時至今日，五四紀念仍難免「熱鬧有餘而成果欠佳」（頁213），喧囂的背後不是生氣，而是五四在現實層面的變形和後製。

陳平原總是在書齋內外，認真面對可能會磨損和束縛人們理解五四的現象。新世紀以來，傳統、國學、儒家的地位不斷攀升，「五四」在這些論述中受到質疑甚至批判（頁37），近年在國學熱、大國崛起和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批判傳統」也成為某種禁忌（頁212）。作者自覺站在「新文化」的立場上回應文化保守主義思潮，但保持開放的態度：對於「五四」，「可以讚賞，也可以質疑，但最好不要輕言『超越』」（頁211）。如此才能在不斷的「對話」和「思想操練」之中賦予「五四」生命力。

時勢推動着思考，也帶來種種限制和困境。陳平原認為：「當下中國，《五四研究》的主要潛力及

新世紀以來，傳統、國學、儒家的地位不斷攀升，「五四」在這些論述中受到質疑甚至批判。作者自覺站在「新文化」的立場上，但保持開放的態度：對於「五四」，「可以讚賞，也可以質疑，但最好不要輕言『超越』」。

作者擔心的大概是五四研究在學界各種看似喜人的推進無法與時代共鳴和對話，反而在現實和社會層面壓縮了「五四」的意義和生命力，讓「五四」像儒家學說一般，也有被送進「博物館」的危險。

使命不在史學探索，而是思想操練——這既是其巨大優勢，也很容易成為陷阱。」(頁137)作者的判斷可能未必人人都會同意，但其提醒和立場也自有道理。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指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近代起即被「送入歷史，並蓋上了『非當代』的印戳」，「博物館化」後逐漸遠離社會情境^③。作者擔心的大概是學界各種看似喜人的推進無法與時代共鳴和對話，反而在現實和社會層面壓縮了「五四」的意義和生命力，讓「五四」像儒家學說一般，也有被送進「博物館」的危險。羅志田就觀察到：過去二十年的歷史研究，連教科書和一些專業學者都未曾受影響，遑論社會中的非專業讀者，故「五四」仍有「再認識」的必要^④。對於「五四」這樣飽含巨大思想能量的歷史話題來說，出現這樣的現象實在遺憾，也值得反思。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與「五四」對話還遠遠不夠。

無怪乎五四百年紀念時，作者仍不無擔憂：年輕一代對於五四一代的思考語境缺乏理解；五四紀念口號化和空洞化；學界的五四論述缺少理論省思和提升；五四研究「沒能因應時代話題，也無法介入現實生活」(頁219)。可見，「五四」之價值和歷史地位儘管無需多言，但要想讓其「在眼下仍然活着」，並「活生生地發揮作用」^⑤，仍需在代代相接、波波相續的對話之中，不斷激發活力，捕捉靈感。這或許才是未完的、元氣淋漓的「五四」。

如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 Carr)所提醒，歷史進程猶如「在

遊行的隊伍」，「伴隨這支隊伍以及這支隊伍中的歷史學家前進時，不斷地出現新景物、新視野」^⑥。我們不斷與之對話的「五四」或許仍在變化和形成之中，「五四」這塊「磨刀石」也會在對話之中被磨洗和改變。當五四記憶和固有認知被更深入地認識，我們與過去對話的方式也要發生改變，才能讓「五四」成為一種應對時代之間的源頭活水和精神滋養。

四 結語

錢穆說：「學問背後必然有一個『人』」，「我們必須了解到每一書的作者，才懂得這一書中所涵蘊的一種活的精神」^⑦。由《未完的五四》一書的文字和表達，相信讀者能夠感受到陳平原與五四精神的共鳴和交織，體味到深蘊其中的「活的精神」。作者明快清晰、直抒胸臆的行文風格，讓閱讀過程充滿愉悅和酣暢。「五四」的世界本來聲音多元、思路繁多，但其文字在呈現這些複雜而纏結的歷史面相時，往往舉重若輕，深入淺出而不失趣味。有論者注意到陳平原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一書中還原五四運動那一天的具體歷史細節時，精心搭建了「帶有小說趣味的情節結構」^⑧，使得其考證文章嚴謹而不失生動。而收入本書偏向說理論辯的文章(如〈走不出的「五四」?〉)，也洋溢着願意邀請讀者同行同思的強烈對話意識。

陳平原說自己是「站在80年代看『五四』」，或者說，用『五四』來理

解 80 年代」^①。這深刻影響了作者談論「五四」的立場和個性。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讀者不一定全然贊同作者對於「新文化」的偏愛，但作者念茲在茲的「五四」之於當今中國和未來中國的重要性仍值得充分的重視。正如傅斯年所言：「『五四』未嘗不為『文化的積累』留下一個永久的崖層。」故「文明是積累的」，「傳統是不死的」^②。不論採取怎樣的立場，那個時代求索的問題、開啟的討論和待解的困惑，今日仍值得細細品味和清理。

作者努力要呈現一個複雜多元、眾聲喧囂的「五四」世界，十分注重思想爭鳴和對話的一面，但其考察和論辯主要圍繞新文化運動陣營展開。以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影響和貢獻論，當然無可厚非，並且仍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必要。但在這種視角的籠罩下，那些沒有參與論爭或積極回應的群體和人物則難以納入視野。不論是近年新文化史新風吹拂之下五四研究的新進展^③，還是深描五四地方性知識和實踐的努力^④，都顯示出「五四」不僅僅是言說和思想的歷史，其間錯雜多端遠超以往的認知。

作者注意到嚴復曾在私人信件中嘲笑林紓與新派糾纏（頁 74）。但實際上，當時老一輩多有「旁觀和聽之任之」的心態，並不願意在公開場合發聲^⑤。當愈來愈多被淹沒和遮蔽的聲音被發掘，在構建思想的喧囂之時，這些並非針鋒相對的喃喃低語也值得關注。進言之，我們看到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喧囂和巨大聲勢不免包含「製造」的成份，同時需承認五四在社會和地方層面

亦有其根基和擴散的過程，如何重新理解五四場域中各種交疊競爭的行動和言說，如何理解那些刻意被歷史當事人壓低的聲音和表達，並將之納入「五四」的歷史圖景，仍值得思索。

社會和時代的風雲變化，不免如魯迅所言：「讀書的人，多半是看時勢的。」^⑥但好的文字常能緩緩流淌入讀者的心中，總能久久留存在讀者的腦海，更能不斷在與所謂「時勢」的對話中汲納養分而常讀常新，啟人思考，令人回味，本書就屬於此類。陳平原的文字頗具張力與熱力，讀者倘若輕啟扉頁，無疑可以深深領略「五四」的溫度和分量。可能是由於成文時間先後不一，本書的不少文章內容存在重合，一些重複仍不免影響閱讀感受，後續如再版，或許可以適當節略。

作者努力要呈現一個複雜多元、眾聲喧囂的「五四」世界，但其考察和論辯主要圍繞新文化運動陣營展開，那些沒有參與論爭或積極回應的群體和人物則難以納入視野。

註釋

① 李大釗：〈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1921年5月4日），載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註：《李大釗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 379。

② 陳平原：《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③ 如李浴洋：〈對話「五四」：理解歷史與關懷時代〉，《北京青年報》，2018年6月30日，A15版；《文藝爭鳴》，2018年第9期，「《作為思想操練的五四》評論小輯」，頁 39-66；張廣海：〈通過對話「五四」實現自我啟蒙——讀《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名作欣賞》，2019年第1期，頁 12-16。

④ 參見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

⑤ 陳平原：〈導言：文本中見歷史 細節處顯精神〉，載《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頁3。

⑥ 季劍青：〈激活歷史的方法——讀《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文藝爭鳴》，2018年第9期，頁61。

⑦ 張灝：〈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載張灝著，任鋒編校：《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285。

⑧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1919年10月30日），載歐陽哲生編：《傅斯年文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347。

⑨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318。

⑩ 陳平原：〈清末民初言情小說的類型特徵〉，載《「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頁274。

⑪ 例如，關於梁啟超等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可參見彭鵬：《研究系與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陳捷：《研究系與〈時事新報·學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1）；周月峰：《另一場新文化運動：五四前後「梁啟超系」再造新文明的努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陳捷另有百萬餘字的《研究系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待刊。

⑫ 王汎森：〈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4月號，頁19。

⑬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劉文楠譯：《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三部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頁473-81。

⑭ 羅志田：〈自序〉，載《激情年代：五四再認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頁7。

⑮ 柯林武德（Robin G. Collingwood）著，陳靜譯：《柯林武德自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94-95。

⑯ 卡爾（Edward H. Carr）著，陳恒譯：《歷史是甚麼？》（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頁123。

⑰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18、17。

⑱ 楊聯芬：〈「走出」之後的「返回」——評陳平原近著《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載王風、李浴洋編：《陳平原研究資料》（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22），頁227。

⑲ 陳平原：〈未完的「五四」與複調的「新文化」〉，《名作欣賞》，2023年第25期，頁42。

⑳ 傅斯年：〈「五四」偶談〉，載《傅斯年文集》，第六卷，頁264；〈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載《傅斯年文集》，第五卷，頁240。

㉑ 如王汎森：《啟蒙是連續的嗎？》（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0）；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21）；季劍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

㉒ 近年最重要的著作當是陳以愛：《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香港：開源書局，2021）；瞿駿：《大風起兮：地方視野和政治變遷中的「五四」（1911-1927）》（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關於地方五四運動研究的反思，可參見瞿駿：〈談五四運動研究的推進〉，載《立幹以扶枝：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基本議題十講》（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頁89-97。

㉓ 張仲民：〈新文化運動的「五四」起源——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再思考〉，載吳曉群、陸啟宏主編：《西方史學史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頁181-82。

㉔ 魯迅：〈致臺靜農〉（1927年9月25日），載《魯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74。

楊秋雨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